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

〔日〕佐藤三郎 著
徐静波 李建云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

〔日〕佐藤三郎 著
徐静波 李建云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日)佐藤三郎著;徐静波,
李建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11463-0

I. ①近… II. ①佐…②徐…③李… III. ①中日关
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 IV. ①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6424 号

责任编辑 赵蔚华

封面设计 张志全

·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

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

[日]佐藤三郎 著

徐静波 李建云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231,000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463-0/K · 1992

定价 38.00 元

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换句话说,自日本战败以前起即从事日中关系及日中文化交流研究的有四个人。从我与他们交往的顺序而言,分别是竹内好、佐藤三郎、中村忠行和永井算已四君子。

竹内好自己也有很多著述,此外在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中,对于我的工作他比谁都有更深切的理解,给过我不少帮助,这使我难以忘怀。

天理大学的中村忠行,主要研究的虽是日本文学,但在近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方面,也写了大量的论文,数量之多令人惊讶。

信州大学的永井算已,主要研究日中政治关系,可惜的是前几年去世了,最近汲古书院要出版他的《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

与佐藤三郎的相识,我记得是在中国北京,时间是在1938年岁尾。在本书中也有述及,其时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北京设立了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1938年冬佐藤开始到该图书馆工作。恰好这个时候,我也作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特别研究员去了北京(因此,我们两人与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都有过关系,对中国有过“对不起”的地方)。

我们两人由已故的安藤更生君介绍而互相认识了。

我是在9月抵达北京的,比佐藤稍早一些。我到了北京后,立即就开始了收集《东游日记》(中国人写的日本游记)的工作。因为我当时刚开始写作《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在写作中了解到了《东游日记》是留学史研究上的一项重要资料。

我是从恩师渡俊治先生那儿借读了黄璟的《游历日本考查务农记》(1902年序)后知道了这一史实的。我由此知道了这里边有不少章节写到了留学生的生活及对学校的描述介绍等,在留学史研究上有很重要的

史料价值。

到了北京，定下了住宿的地方，第二天就来了好几个代为访书的书贩。我马上对他们说，我想要中国人写的《东游日记》。他们争先恐后地给我去收集，即使有重复，我也一一买了下来。

我自己也到了书店去搜访。

我初次见到佐藤的时候，与他谈起了这件事，他对此也很有兴趣，开始了书刊的收集。

1939年过年时举行的琉璃厂厂甸中，又一家书坊贴出了《东游日记》的很大的广告。也许是店家知道了日本人正在搜寻《东游日记》的事吧。其实，闹得他们把这当成了一宗大买卖的，是实藤和佐藤这两个藤。

以此为缘，我们俩以后就成了互相帮助的研究同行。

我从战前起就一直孜孜从事的研究工作中，有一项是大河内辉声的卷帙浩繁的笔谈集。那时还没有缩微胶卷，我就一本一本地从平林寺借出来自己抄录。一直到战后还没有抄完，佐藤就帮助我抄录了好几本。

从这些文献中，佐藤有了一项很重要的发现。

这发现是这样的。

在中国有一套王锡祺编辑的名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丛书，共有12册，收集了国内和国外的地理书刊和旅行记。其中有一种《日本纪游》。书中记述了某位中国人于1880年在长崎、神户、京都、横滨、东京等地对日本作了约一个半月的考察，其间与华侨和日本文人等进行交往的情景和感想。这一时期还很少有中国人到日本来，因此是一本很精彩的文献。但该书的作者为“阙名”，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但是佐藤借助大河内辉声的笔谈集，明确地指出了该书的作者为何人。

《日本纪游》的光绪六年(1880)4月17日的一节中，记叙了华侨王漆园曾带他去访问了源桂阁：

“桂阁年仅三十余，淡泊不仕，以诗文自娱，笔谈半时许，同游上野博物院，至小西湖（不忍池）午饭。”

源桂阁，即是上文提及的高崎城主大河内辉声。

佐藤读了之后，便到大河内辉声的笔谈集中去寻求佐证。

光绪六年4月17日是旧历，相当于明治十三年5月25日。

佐藤翻开了应该有这天笔谈的《庚辰笔话》的第9册。有了！其内容如下：

“名曰李筱圃者数度来访。十时筱圃从仆两人来，于乐水阁。”

以上小标题用红笔标出，有在宅邸内中国式的客堂乐水阁中进行的笔谈。下面又用红笔标出：

“至上野美术会参观后于小西湖畔三川屋小酌。”

《日本纪游》中记为“酒楼”，而笔谈集中则为“三川屋”这一专有店名。

由此搞清了长期以来被当作“阙名”的该书作者乃是李筱圃。佐藤通过调查还知道了李当时任江西省吉安府的抚民同知。

佐藤将这一发现写成《关于日本纪游一书的著者》一文发表在1960年5月号的《日本历史》第143号上。

对佐藤的这一发现感到高兴的并不只是我这个笔谈集的发掘者，中国的研究者也感到很高兴。

今年（1983）3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此为“走向世界丛书”中的一册，由王晓秋标点，史鹏校注。王晓秋为北京大学教授。

王晓秋在《始穿重雾看东邻》的序文中，介绍了《日本纪游》一书，作了如下的论述：

“《日本纪游》我们只见过收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的一种版本，署名‘阙名’。日本学者佐藤三郎研究《大河内文书》与中国人的笔谈，发现《庚辰笔话》中有大河内辉声（即源辉声，号桂阁）同一位叫李筱圃的中国

文人交游的记录：两人在源辉声家中笔谈后，又一起参观了上野美术馆，并到小西湖‘三川屋’小酌。而《日本纪游》庚辰（光绪六年）4月17日正好记载有到源辉声家拜会，‘笔谈半时许，同游上野博物院，至小西湖酒楼午餐’，与《庚辰笔话》若合符节。这就证明，‘网名’就是李筱圃。”

佐藤与我的交往一直持续未断，前几年曾应某出版社之约，一同翻译了黄尊三的《日本留学日记》。

说起来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1960年，首次应新中国的邀请，我作为“文字改革考察日本学术代表团”（团长土岐善麻吕）的成员访问中国的时候，我将战争时期非法从中国带回来的40余册书籍、杂志还给了中国。我将此事告诉佐藤时，他让我将黄尊三4本《三十年日记》中的《日本留学日记》用照相拍下来，于是整本书都拍了照片留存了下来。

出版社请我译这本书的时候，我请佐藤一同来译，他爽然应允，于是两人一起译出了此书。照片共有一千多张。译出后交给了出版社，可不知为什么，译稿退了回来，现在仍在佐藤手里。

我拜读了这本书，觉得每一章都是潜心认真研究的结果，我受到了不少启发，对此甚为敬服。

第一章《明治前期中国人研究日本的著述》，是根据1940年11月发表在《历史学研究》第10卷第11号上的《明治维新后甲午战争（原文为日清战争——译者）战争以前中国人的日本研究》于1982年改写的，1940年发表的时候，我曾从中受到了很大启发。同样在读《东游日记》时，我对竟有这样的归纳方式感到甚为惊讶，至今仍记忆犹新。

前文也已提及，1983年3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副标题“记述从闭关锁国到甲午战争四十余年间的日本”。这与佐藤的“明治维新后甲午战争前”在起始期（培理率舰队来日本与明治维新）上虽有些小的差异，但两者的想法基本上是很相近的。

佐藤的论文中介绍了七种书,《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重印了五种书。两者中相同的有《使东述略》和《游历日本余记》。

自数年前起,中国的日中文化交流开始兴盛起来,北京、沈阳、长春都诞生了研究团体。标点《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的王晓秋教授也是北京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的重要成员。

我相信佐藤的这些论文也在这些研究会中被人们讨论过。

第二章《对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的考察》,我对这一题目极有兴趣。

我也曾在这方面写过几篇文章,但其研究方法与佐藤比起来真是有点羞愧。我在考察“支那”成为日语中一个熟词的过程时,只是采用了按着年代顺序将诃竹默阿弥的脚本读下去的方法。和我这个未受过历史学严格训练的外行不同,佐藤是国史学科出身的学者,所以进行的正规的学术调查。即他不是局限于某一部门,他研究的材料涉及公文档案、日记、书简、报纸、教科书类等各个重要的方面。由此作出的学术结论能够使读者十分信服。

“支那”一词,现在正在变成死语。在本书中作者写道:

“‘支那’现在差不多成了死语。我曾经对山形市内的 473 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是知道‘支那’一词的 462 人,但在称呼中国时日本人均不使用‘支那’一词。”

可以想象,不久之后中学生连“支那”一词也不知道了。

再过 30 年,世上的人们也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佐藤在这一词语上花这么大的工夫呀?因此我在这里要再说明一下。我提请大家不要忘记,倘若不能正确地称呼别的国家,就会引起问题——不,准确地说,倘若某一外国不放在眼里的话,即便国名没有念错,也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现在我们用的“朝鲜人”这个词,虽然这个词本身没有错,但由于以前用这个词时是带着轻蔑的口吻的,因此我们今天说这个词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一点顾忌之心么?

我对第九章的《关于中岛裁之的北京东文学社》也很佩服。我虽然见过中岛裁之本人，却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佐藤在中岛裁之亡故后与他的遗孀互通信函，并拜访了东文学社时代的同事三岛海云，然后写出了这篇力作。

此外，如千岁丸的上海之行、琉球藩处理的问题、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近代日本的鸦片问题、日本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等，都是我未曾研究过的问题，大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

这本好书写出来了。佐藤，接下去你还要发表什么成果？我衷心期待着。

实藤惠秀

1983年11月27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明治前期中国人研究日本的著述	1
引言	1
第一节 《使东述略》和《日本杂事诗》	3
第二节 《日本地理兵要》和《东槎见闻录》	6
第三节 《日本国志》	10
第四节 《日本新政考》和《游历日本图经》	13
结语	16
第二章 对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的考察	19
引言	19
第一节 近世日本人对中国国名的写法	20
第二节 明治以后有关中国国名的写法	31
第三节 由“支那”一词的使用而引发的问题	37
代结语	48
第三章 1862年幕府贸易船千岁丸的上海之行	53
引言	53
第一节 幕府末年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	53
第二节 千岁丸的派遣	56
第三节 幕府官吏对贸易情况的调查	60

第四节	藩士们对中国情况的观察以及他们的中国观	63
	结语	74
第四章	对处理琉球藩问题的考察	77
第一节	近世以前琉球和日中两国的关系	77
第二节	日本政府对琉球同属日中双方的态度	82
第三节	台湾事件后日本和琉球之间的反复较量	86
第四节	强行处理的经过	89
第五节	处理前后的琉球士族社会	96
第六节	农民对处理的态度	99
第七节	处理的结束	101
第八节	当时有关处理的舆论	103
第五章	甲午战争前日中两国的相互国情探索	108
	引言	108
第一节	明治初年日本对中国的探索	109
第二节	日中双方围绕台湾、琉球事件的举动	112
第三节	1884 年的朝鲜事变爆发后	121
	结语	126
第六章	论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以当时中国人的时局论为中心	130
	引言	130
第一节	开战前的形势判断和关于初战情形的报道	131
第二节	战况实情的判明与民众的批判	136
第三节	反对讲和、主张继续抗战的舆论	139
第四节	对战败原因的反省	147

第七章	近代日本的鸦片问题	152
	引言	152
	第一节 幕府末期的鸦片取缔问题	153
	第二节 明治前期有关鸦片的问题	156
	结语	176
第八章	日本佛教在中国的传教权问题	182
	第一节 日本佛教在中国传教的失败尝试	182
	第二节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人对传教权的关注	187
	第三节 甲午战争后日本佛教在中国的传教情况	194
	第四节 日中两国关于传教权的论争	201
	第五节 为确立传教权而施行的政策及其效果	209
	结语	221
第九章	关于中岛裁之的北京东文学社	228
	引言	228
	第一节 北京东文学社的设立	229
	第二节 北京东文学社经营上的困难	239
	第三节 课程运作和学生指导	254
	第四节 以开发中国之风纪为目的的事业	258
	第五节 中岛的退任和将学社转让给中国	264
	结语	270
	后记	275
	译后记	278
	补记	280

第一章

明治前期中国人研究日本的著述

引言

日本自国家草创时期以来就一直是在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摄取方面一直是比较迅捷敏锐,尤其热衷于中国书籍的传入。奈良时代的遣唐使曾倾其囊中所有购买中国书籍的事迹,在《旧唐书·倭国日本传》也有记载,这种热情已引起了中国人的瞩目。即使是在江户时代的锁国时期,幕府和各地诸侯也纷纷争相收购驶抵长崎的中国商船运载来的善本良书,各以自己的藏书之丰而自豪。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有关政治、道德伦理、宗教方面的书自不待言,连医药、天文历书、技术工艺、文学乃至稗史杂录等,几乎所有领域内的中国书籍都传到了日本,培育了日本人的知识技能和情操,其中尤其如《史记》、《汉书》等类的史书,日本人不仅由此了解到了中国历史王朝的兴败盛衰,而且被认为是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在日本国内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被多次复刻后刊行流布,在武士社会中被认为是培植教养的必读之书。^①

日本人的目光是如此地注视着中国,而中国人对日本的兴趣怎么样呢?毋庸赘言,在中国的正史和其他的书籍中可见到相当不少有关日本的记述,但就中国而言,日本不过是东夷列国之一而已,因此在宋以前的记载中,有关日本的地理和朝贡关系的内容占了大部分,诸如日本民族是自尊心极强的民族,派遣来华的使节中多为知书识礼富有教养之士,日本国王是由一个家系一脉相承,而无中国那样的易姓革命,日本国内出产质

地上等的刀剑等。至明代后,日本海盗频繁出没于临近中国的海面,使中国沿海地区蒙受了重大的损害。为了击退日本海盗,阻止损害,不少中国人痛切地感到要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了解,因此一时形成了研究日本的热潮,《筹海图编》、《日本一鉴》、《日本风土记》、《日本考略》及其他多种研究日本的优秀著作先后问世,中国人不仅留意日本的地理和军事等,而且将目光投向了政情、语言和文学等领域。但是在这之后,随着日本海盗活动的日渐平息,及日本施行锁国政策,日本航船不再来往于中国,中国国内研究日本的热潮也随之退却。在江户时代的锁国政策之下,每年虽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贸易商船驶抵长崎,但船上的人员几乎均为商人和水夫,而且在日本逗留期间原则上只能居住在中国人的屋舍之内,因此在他们中间很少产生研究日本的著作,仅留存有汪鹏所著的《袖海编》^②,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本书所记录的是从中国人的居住区内所观察到的日本。

中国史书在日本有很多人阅读,而日本的史书,《古事记》也罢,《日本书纪》以后的六国史也罢,都未被介绍到中国去,只有宋时曾去中国留学僧裔然带去了一部《王代略记》,这是一部编年体格式的文献。此外在江户时代由中国商人传入了一部《吾妻镜》,引起了一部分文人的注意,但即便是《吾妻镜》,他们也未必能读懂其记载的内容,只不过是日本人将汉字排列成中国人难以读懂的语序而由此写出的文章感到好奇而已。^③到了幕府末年,与西方各国已建有邦交的德川幕府,也开始考虑与中国恢复邦交,于是在1862年以贸易的名义派遣的官船千岁丸驶往上海,以试探中国方面的态度。继而又在1864年派了幕吏山口举直等人乘坐健顺丸前往中国,此时,上海道台应宝时询问山口有否带来岩垣松苗的《国史略》,由此可推测这部书在中国已为人所知晓。不巧,同行的人中无人携带此书,山口便代而赠之以赖山阳的《日本外史》^④(赖山阳,1780—1832,江户后期的儒学家,在史书编撰和诗文上均有建树,著作除《日本外史》外,还有《日本乐府》和《山阳诗抄》等——译者注)。此后,为了购买武器

及其他事项,也曾有几个藩主(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诸侯——译者注)向上海派遣过武士,将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日本政记》等书籍带入了中国。^⑤此外,在明治维新以后,两国间缔结了条约,1873年,为交换批准文书,派了外务卿副岛种臣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前往北京,在这次访问中,日本政府向总理衙门(正式名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的中国政府机构之一,相当于日本的外务省)赠送了《大日本史》10部,向总理衙门管辖下的同文馆(相当于培养外交官的外语学校)及照顾大使一行的官吏孙士达各赠送了该书一部。此外还向同文馆的外籍教师、将不少西方书籍译成中文的美国人丁韪良赠送了一部《日本外史》。^⑥这样,日本的史书也陆续介绍到了中国,在中国人中间产生了对日本的兴趣,并逐渐出现了研究日本的势头。

另,本书中的明治前期,基本上指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不过,自明治六年(1873)以后,日本纪年和中国纪年在日月上多少有些差异,因此在表明中国书籍写成的年月等时,在标示中国年号的同时,也标明日本的年号。

第一节 《使东述略》和《日本杂事诗》

明治六年(1873)4月,《中日修好条约》生效。根据该条规,日中两国各自在对方国家派驻使臣。日本在同年11月24日任命了山田显义为首任驻中国公使,但由于山田在尚未赴任之际便转任了别的官职,所以事实上成为首任公使的,是明治七年(1874)7月22日任命的柳原前光。而中国方面的任命派遣,则要比日本稍迟些,在明治十年(1877)1月15日(光绪二年12月2日)任命了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首任驻日公使(出使日本大臣)。恰好这时日本发生了西南战争(指1877年西乡隆盛在九州南部策划的针对明治政府的叛乱,后叛军被政府军击败,西乡在9月自杀——译者注),政情不稳,何如璋一行便暂缓赴日,以观察日本政局的发展。9

月10日,何如璋在随员的陪同下,从北京出发,在上海搭乘军舰海安号,途中经长崎、神户、大阪等地,沿途考察了各地的实情,翌年1月16日(光绪三年12月14日)住进了外务省在横滨准备好的临时公使馆,并在此前的1878年1月4日(光绪三年12月2日)与随员一同前往东京,向天皇递交了国书。

何如璋在赴任之前想尽可能多地了解日本,也曾阅读了赖山阳的《日本政记》和《日本外史》,因此对于日本事先已经有了相当的知识。作为首任公使,他怀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于是便将赴任途中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所感一一记入日记,题名为《使东述略》,并将沿途所作的65首七言绝句辑为《使东杂咏》,作为一种赴日报告一起呈交给了北京的总理衙门。^⑦在这些诗文中,何如璋首先记述了自己一行在日本到处受到热情欢迎的情景,以及日本各地华侨的生活,日本人的衣食住行的情状,并且指出,在日本国民中虽有在中国为人们所谈及的热衷于模仿西洋的风潮,但对孔子、儒教的崇敬之心依然顽强地根植于一般民众之中。此书还记述了因日本政府滥发纸币的政策而致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的当是日本的世情。在《使东述略》的最后他这样写道:

“海陆之所经,耳目之所接,风土政俗,或察焉而未审,或问焉而不详,或考之图籍而不能尽合。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偶有所感,间记之以诗,以志一时踪迹。若得失之林,险夷之迹,与夫天时人事之消息盈虚,非参稽焉,博考焉,目击而身历焉,究难得其要领。宽之岁月,悉心以求,庶几穷原委,洞情伪,条别而详志之,或足资者之考镜乎?是固使者之所有事也。”

他认识到对日本有必要继续加以研究。

考虑到当时的惯行做法,《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两书想必应由总理

衙门作为官版印行出版,不过在民间书坊确实也出版了几个不同的版本。这一事实可说是表明了这两种书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受到了人们的注意。

与何公使一同来日本的随员中,有不少如副公使张斯桂这样的优秀文人。张斯桂比何公使还年长,他是《万国公法》一书序文的作者,此书在幕末自中国传入日本,向日本人传授了国际法的知识,因此张斯桂在当时日本的知识阶层中也是一位有相当知名度的人物。^⑧不过这里应引起人们注目的是官位在其之下的书记官(参赞)黄遵宪。

黄遵宪,号公度(应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译者)来日本时 30 岁,与何公使有姻戚关系。来到日本后立即对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打算写一部有关日本的综合性的研究著作,于是便开始涉猎各个领域的有关文献。在东京开设中国公使馆,使得当时熟稔汉诗汉文、对中国怀有好感的日本文人感到十分欣悦,不少人来造访中国公使馆,希望与中国使馆的人员交往。黄遵宪也热情地与这些人互相往来,请他们答疑解惑,同时还从他们那里借阅书籍,或是到各地区采访文献,积极开展研究。他在很早就显露出了诗人的才气,为文坛所瞩目。^⑨因此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他还以引起强烈兴趣的日本诸种事物为题材,先后写下了多首七言绝句,并在每一首之后附有注释。他将 154 首诗编成《日本杂事诗》2 卷,于光绪五年春(明治十二年,1879)提交给了同文馆。同文馆认同了此书的价值,于同年冬在北京以官版的形式出版,以后此书又由黄的朋友王韬通过其在香港经营的循环日报馆印行出版,并且在日本由东京的风文书房刊行。该诗集除了题材的新颖和观念的新鲜外,在中国被看作是介绍新日本概况的诗集,在日本被看作是吟咏日本事物的诗集,在日中两国的文人间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在此后不断地由日中两国的书店争相刊行,其中有不少并未取得作者的允准,因而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版本。

《日本杂事诗》中所吟咏的事物,诚如日本人石川英在该书的跋文中所述:“上自神代下迄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乃至服饰